

中国汽车制造总厂的前尘往事

罗先进 余意明 沈言锦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兼株洲总厂副厂长张德庆

中国动力谷位于湖南株洲湘江河谷,这里有湘江第一湾之美誉,聚集着以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等三大动力产业为核心特色的产业集群。

株洲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地位重要。1937年2月在这里成立的中国汽车制造总厂,是中国第一家由中央政府主导设立的汽车制造总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中外合资的汽车,开启了中国汽车迈向现代化的历史。

民国的汽车工业梦

早在清末,我国即有汽车引进。民国时期,中国人有了自己制造汽车梦想。1928年,张学良曾在东北聘请美国人研发生产汽车。1931年6月,辽宁民生工厂在沈阳研制出第一辆国产载重汽车,命名为“民生牌”,它开辟了中国人试制汽车先河。1935年,上海的汤仲明创办仲明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改造生产木炭汽车。但这些厂子都是地方政府或者个人的努力,并不成规模。

1936年1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南京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元,主要股东有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各部会、各省建设厅等,曾养甫、张静江、宋子文、陈果夫、俞大维等19人出任董事,董事长由时任民国交通部长的曾养甫兼任。

汽车作为一种现代交通工具,无论民用还是军事,其作用都是巨大的。一个国家如果自己不能生产而完全依赖进口,则容易受人掣肘。严鹏在《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一书中记载,曾养甫提议创办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是因为感到中国单纯依靠进口汽车,不仅花费巨大,而且“一旦海疆有故,且恐因无法入口,交通上发生严重问题”。曾养甫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1935年曾养甫奉委以商业化方式创办汽车事业,于次年组织成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

由此可见,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这家官商合办的股份制企业,是在蒋介石的直接支持下成立的,也是中国第一家中央政府主导设立的汽车制造公司。

中国汽车制造总厂往事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成立后,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由奔驰汽车厂派出以主任工程师冯格腾为首的20名专家来华协助建厂。合同期间,奔驰汽车厂向该公司提供7000辆载重2.5吨的柴油汽车零件,在中国组装整车。5年后,汽车零部件自制率达100%,全部由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自己制造。

1937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确定在全国交通枢纽之地的株洲设立中国汽车制造总厂,另在上海设立汽车制造分厂,中国机械工程专家张德庆任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兼株洲总厂副厂长。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选址于粤汉铁路(今京广线)株洲报亭车站附近(今石峰区九龙山村),该厂规模庞大,占地逾133万平方米。

1937年2月,大批从德国引进的汽车底盘从粤汉铁路源源不断地拖到株洲,进行组装。中国产的第一辆2.5吨载重的柴油汽车(奔驰军用卡车)出厂,标志为中国外加工一个圆圈,所以又称“中国牌”。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分厂将大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搬迁到了株洲总厂。1938年日寇侵犯湖南,株洲总厂多次遭飞机轰炸,被迫将一部分设备迁至重庆,称华西分厂;一部分迁至香港九龙,称南华铁工;一部分设备运往桂林良丰,建成华南分厂。总公司则由上海迁往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后,总公司机器设备被日军拆运到了日本。

总厂旧址旧物见证历史沧桑

2013年9月,株洲市文物局根据群众提供线索,在石峰区九郎山村发现民国时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旧址及界碑。

石峰区九郎山村东接湖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三六处,南临京广铁路,西接吴家大岭,北距320国道约200米。

考古专家现场发现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2块界碑。经考证,1号界碑长158.5厘米,宽23厘米,厚15厘米,碑上部正面磨平,长60厘米,上面有楷体阴刻“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石”字样,字迹工整有力,清晰可辨;2号界碑底座残缺,残长92.3厘米,面宽23厘米,厚10.5厘米,其它特征相同。

考古专家还发现总厂建筑旧址,包括办公室、厂房车间、发电厂、宿舍、食堂和防空洞等。其中办公室现已毁,但房基保留较完整。办公室原

为叶家祠堂,后被征用作为办公室,原石灰、泥、纸筋墙面曾被当时的技术人员用水泥替换。厂房面积约6万平方米,系单层砖木结构,共分六排,呈纵向排列,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湖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三六处征用作为仓库,后被拆毁。发电厂位于旧址北部,现已毁。总厂宿舍、食堂位于旧址东南部,现仍在使用。防空洞则位于吴家大岭东坡,两大一小南北排列,最北的大洞保留现状,为砖混结构,成人可直行进入。

民族危机与国民政府对湖南的战略设想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先是东北,再是华北,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全盘战略野心。湖南尚属于战略后方,国民政府高层纷纷提出重点建设湖南,以之为国防中心。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引起了中华民族的忧虑,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防安全已显得刻不容缓。

据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一书记载,1932年,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向蒋介石写信,提出“无论从地理及民族性言,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像欧洲的德意志一样。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国民党军政要人陈诚谋划将湖南作为国防要地建设。根据《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一书记载,1936年9月,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1936年10月,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以湖南为首选。

实业部选择在株洲建汽车制造总厂原因

民国时期的株洲,是湘潭县管辖的一座千年古镇,民国政府实业部何以选择这里作为中国汽车制造总厂的地址呢?

首先,早在1921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有把株洲作为中国南方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基地建设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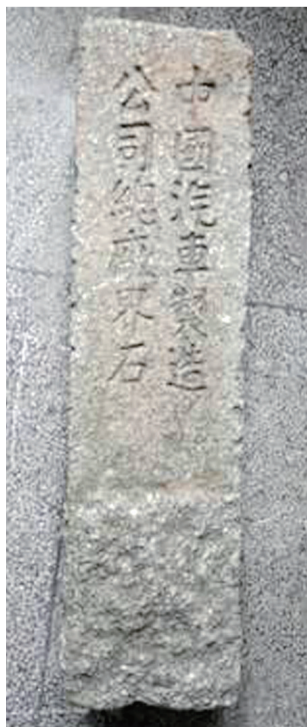
其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过多年的建设,株洲已经成为中国南方的交通枢纽。在当时全国铁路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连接株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全线通车,1938年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通车。三线交汇,株洲可直达两广、湖北、浙江,抗战后的株洲更是成为进出大西南后方基地和连接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

再其次,抗战前,国民政府在株洲布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业并拟迁都株洲。

蒋介石本人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曾两次到株洲,并在株洲检阅军队,对株洲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深刻的危机,开始在株洲沿粤汉铁路附近布局工业。1936年、1937年,引进德国技术的民国兵工署第10兵工厂、实业部的中国汽车制造总厂,引进英美技术的铁道部株洲总机厂,相继在株洲投产,由蒋介石自任校长的陆军兵工学校也由南京迁到株洲。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提及的把株洲作为中国重要工业基地建设的梦想逐步实现。

国民政府还曾打算临时迁都株洲。中国近现代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晓宁著的《国府还都》一书中称,1936年,国民政府曾有非常时期将政府迁往湖南株洲的方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1936年秋国民政府曾对非常时期国民政府迁往“有蒋介石政府机关迁往株洲之方案”。

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湖南由战争后方变为战争前方,中国汽车制造总厂等株洲几大工厂相继迁往外地。民国株洲汽车工业,因日军的侵略而受阻,但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共和国建立后,交通、区位优势与工业文明的底蕴将株洲催生成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继而成长为今日中国的动力之谷。



2013年9月考古发现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碑之一

教师节,这位从炎陵山区走出的著名教育家值得铭记
何炳麟,倾家荡产也要办好教育

王琨



何炳麟

马上又到教师节了。这些年来,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一天天的高涨,很少有人再提起,教师这一群体在旧时的窘迫时光。

在南岳衡山脚下,有一所名为岳云中学的百年名校,在解放前便有“北有南开,南有岳云”之美誉。该校创办人系炎陵中村走出的教育家何炳麟,也是著名革命烈士何孟雄的族叔。在教师节来临之际,重温百余年前株洲乡贤的办学往事,无疑是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创办岳云中学

何炳麟,1877年生于炎陵县中村乡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他的祖父沅公系清朝庠生,曾捐田支持在县城创办的梅岗书院(今炎陵一中前身);父亲成珪是蒙馆教师,也是何炳麟的启蒙老师。

何炳麟在蒙馆学的都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后来进入何氏家族创办的龙门书院学习,青年时期跋涉90里,到祖父支持创办的梅岗书院就读。1900年,24岁的何炳麟在衡州考取秀才功名;次年,又考进了“武昌文普通学堂”,再转入湖南师范学堂。

1903年,在全国的“留日高潮”中,27岁的何炳麟参加了留日考试并被录取,同年8月入日本东京工业学校电气科学习。学习期间,何炳麟结识了湖南同乡、反清志士刘道一,并受其影响剪去长辫。1906年,刘在长沙发动新军起义未果,被捕杀害。1908年6月,何炳麟回国探亲,满族学生诬他为刘报仇而回国行刺,被清军扣于长沙,撤销了他的留日官费,使他无法反日继续。

在朋友的营救下,何炳麟被开释出狱,并被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聘为几何学教师;与此同时,他还在省立优级师范学堂、第一师范、通泰街、东茅街、大瀛洲口。1914年2月,学校再度更名为湖南私立岳云中学,并在荷花池兴建校舍。五年中,该校六迁校址,三更名,办学艰难,可见一斑,但何炳麟的“教育救国”却矢志不移。

粗俗的办学名言

何炳麟办学有两句“名言”流传甚广。其一是“办学敛财,天诛地灭”,岳云学校是私立穷校,穷得经常发不出教师工资,教师来找他,他就自掏腰包,请教师吃顿便饭,言明薪水暂时记账,讨薪教师只好一笑了之。无薪难活,他就向外借钱发薪,年终债主上门,他竟告诉家人“急事外出,明年才回,请莫久等”,自己便到外面躲债去了。后来穷得没办法,他便把自己的手表、皮袍脱下,送到当铺抵押,换点钱发薪水。

上世纪三十年代,岳云骨干教师、教务主任、副校长的月薪为140至160元,而何炳麟给自己这个校长开的月薪则只有100元,低了三分之一。1931年3月,校董会决定,校长办公室每月可开支办公费40元,何炳麟坚持不领,两年后,他将这笔共900元的办公费,全捐给了学校的基金会。

从1912年担任校长,一直到1966年逝世,何炳麟当了五十多年的校长,却未置办任何产业,连祖上遗下来的三十多担田租,也一并捐给了学校,平日喜穿蓝布长衫,冬则棉袄。

何炳麟的另一句名言是“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在他看来,办好学校,不误人子弟,需实行三好:延聘好教师,招收好学生,办成好学校。

在延聘好教师方面,何炳麟聘请了何叔衡、徐特立、曹典球、符定一、刘己明等省垣名师前来任教,风头一时无两。何炳麟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并重,认为“德”是首脑,智、体是双翅;为加强体育教学,曾聘远东运动会十项全能运动员、河北省篮球队主力曹远东运动会长,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前领导于国勋在内的许多著名运动员,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前领导于国勋的父亲马鹤凌、马廷龄兄弟及不少大学的体育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其他学科的名师更多,笔者在校时的英语教授刘天铎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俄语教授文旭是留苏的。由于岳云中学名师云集,而省城长沙的几所师范类的大中学校师资不足,1956年,湖南省教育厅从岳云中学一次性抽调了6位教师调往师范学院。

何炳麟对学生要求严格,数学的等于号需用米尺画齐,等长、数、体一科不及格或其他两科不及格者留级,操行成绩丁等就勒令退学。何炳麟的儿子何国福旷课18小时,教务处未开除,何校长便亲自书写、张贴布告,将儿子开除;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违纪被开除,军官来函质问,母亲来校破口大骂;另一学生数学不及格,未发毕业证,该生寄来一信,内附一颗子弹。何校长均顶回去,拒不更改。

敢为人先的岳云精神

1921年夏,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福湘女中的杨开慧、周南女中的蒋玮(即作家丁玲)、许文旭、王佩琼、杨淑景、周毓明等女生,因思想先进,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皆为女校所不容,他们先是在毛泽东等人的帮助下进入船山学生暑期班,经暑期班教师与何炳麟商量后,均转入岳云中学读书,从而开创湖南男女同校的先例。《大公报》亦以“打开了男女同校的先路”为题,详予报道。毛泽东在1921年9月28日致肖子升信中说“文旭、开慧、毓明三女士,目前无学校可入,现在转入岳云分校,以备不测。5月,在岳云中学现址的紫云书院遗址建校;8月,又在南岳山上创办岳云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林场(做为实习基地)。1938年2月,因敌机轰炸长沙,校本部乃从长沙城北的荷花池迁往南岳,与分校合并上课。

同年9月,国民党军指挥机关迁南岳,军令部指名要借岳云校舍,学校只得迁往八十里外的衡山白果。1944年,南岳、白果相继沦陷,岳云学校学生分批迁往蓝田(今涟源市),抗战胜利后,才于1946年2月迁回南岳。1951年12月,岳云中学由人民政府接管,改称湖南省立岳云中学。从1953年1月起,该校先后改名衡山一中、南岳一中,1966年7月再名衡山一中,1984年3月28日复名岳云中学,并由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题写校名。

何炳麟既是杨开慧的老师、校长,又给毛泽东、周世钊上过课。因此,1959年4月,他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三届大会时,在毛主席的陪同下,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的陪同下,入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一见面就握住何校长的手,连叫几声“何老师”,师生情谊分外深厚。临别时,毛主席送给何校长一句话:“勤俭办学,叫花子讨米不要钱。”

1966年10月2日,何炳麟老先生病逝于长沙,享年90岁,在省会长沙开过隆重的追悼会后,骨灰移葬南岳半山亭。



现在的岳云中学外观



何炳麟墓前,“欲兴邦国,必兴科学;欲兴科学,必先培育人才”的教育主张最为醒目